

1972年2月,关闭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此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除了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各个领域的中美关系活动,前后几十次会见美国领导人和其他美国朋友,还深谋远虑,发表真知灼见,指导中美关系工作的开展,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

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979年初,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一、在联合国讲坛向世界各国宣传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联美反霸的国际战略原则,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它既标志着我国坚定地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共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战略的转变,也标志着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决定向联美反苏策略的转变。邓小平对这个方针热诚拥护,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在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日本、加拿大、欧洲等第二世

界国家具有两面性之后,着重揭露和批判苏联霸权主义的本质和罪恶。他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①

邓小平的演讲准确地表述了毛泽东制定的新方针,不仅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团结了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国家,特别是由于他分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逞强的程度的差别,表明了中国愿意

与美国联手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诚意,这就缓和了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敌对关系。由于邓小平的报告表达了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因而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热烈欢迎,中国因而赢得了众多的国际朋友。他在1981年4月还回忆说:“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②

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继续坚持毛泽东联合美国日本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策略原则。他高度赞扬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说正是毛泽东“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③

二、邓小平明智决策,缩小分歧,求同存异,推动中美建交,实现了两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折,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美关系的大门虽然于1972年打开,但因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和福特总统执政短暂,中美邦交连续5年未能有新的突破。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表现出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性。小平同志认为必须抓住时机,积极推动,使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突破。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性,然而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步骤上却

作出某些让步。这样,中美两国政府终于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于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认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要实现中美邦交,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它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设施,废除它同蒋介石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同时中国也承认: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台可以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非官方关系。美国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就尊重那里的现实制度。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因为那样反而会产生不良后果。

在论述关于共同反对霸权主义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美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这种合作。双方都庄严地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70年代是苏联霸权主义十分嚣张的时期,在亚洲,它支持印度反华和肢解巴基斯坦,支持黎巴嫩集团反华排华,怂恿越南入侵柬埔寨,插手阿富汗内政,先后两次策动阿富汗军事政变;在非洲,它采取由苏联出钱出枪古巴派军队的“打代理人战争”的办法入侵安哥拉和扎伊尔,插手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战争以攫取军事基地等等,因此,邓小平在访美时与卡特交换了意见,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

义,要建立有美国、日本和西欧参加的世界性同盟。中国政府在1979年宣布,不再延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⑤

中美正式建交是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的胜利。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创造性地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的光辉典范。国际舆论赞扬中美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是“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里程碑。”^⑥

三、邓小平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通过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的基本途径,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广阔的道路发展。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美国外交是受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制约的,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又出现波折。建交公报发表仅40天,美国国会即有人提出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1979年3月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同年4月卡特总统正式签署这个法案。里根就任总统前一直宣称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1981年刚就任总统就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邓小平坚持严正立场,对美国背离建交原则损害中国权益的行为展开批评与斗争,同时也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努力寻找中美两国自身需要的全球战略利益的共同点,缩小分歧,求同存异,探索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富有建设性和带来积极成果的渠道。从1979年至1989年10年中,邓小平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与策略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打破紧锁国门的封闭状态,坚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密切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往来。邓小平认为,我国坚定

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而且还拓展了中美双方友好合作的新领域,两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种经济贸易的互惠互补必然为政治上外交上的进一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2、改变我国70年代实行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方针作为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邓小平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⑦这一转变不仅可以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在复杂多变的国际争端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且为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创造有利的条件。

3、提出了“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构想,为排除中美交往过程中的根本障碍开辟了新途径。台湾问题是梗塞中美通道的核心问题。美国政府虽然已同中国政府建交,但它在如何处理对华对台关系上仍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愿意与中国合作,希望拓展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它不愿意彻底抛弃台湾,除了制度与意识的相同、要把台湾当成它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样板外,更重要的是它不愿丢掉太平洋上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力图保住自己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为了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也为了照顾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利益,邓小平以超人的智慧与魄力,大胆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思路。他说,大陆与台湾必须统一,主权完整,一个中国,这个立场是不能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然而统一的步骤方法却可以灵活多样。可以做到“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

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②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受到了海内外华人与国际舆论的支持与拥护,也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1989年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1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布什也说:“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巨大潜力,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③

四、对中美之间的麻烦与纠葛,邓小平采取一面批评揭露美国的错误,一面和解修好的态度,努力使中美关系继续沿着以三个公报框架为基础的方向发展。

1989年7月,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7国首脑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谴责中国采取“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声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次政治接触和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其用心是要逼迫中国仿效苏联与东欧走资本主义

道路。面对这种严峻局面,邓小平认为必须顶住压力,站稳阵脚,一方面抓紧处理好国内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慎重而妥善地对待中美关系。他的对策主要是以下几点:1、揭露西方势力演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指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是注定要失败的。邓小平说,国内动乱和西方国家的制裁都围绕着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④“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们直接插手中国的内政。邓小平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他批评那些攻击中国的人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鉴别、比较和实验的。他断定,中国有决心、有能力捍卫社会主义,西方势力的政治围攻和外交孤立政策,是绝对压垮不了中国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底。”^⑥2、反复规劝和忠告美国当权者:“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邓小平反复

说明中美关系对两国、对全球具有的重大意义。指出,中美关系如何不仅影响到“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而且左右着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他认为在考虑双边关系时,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⑦他还指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这不但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还因为中国是受害者,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中国如果来乞求美国,那必然会丢失国格。3、指出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必须继续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科技交流。为了各自利益,双方应该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摆到一边,努力开辟两国合作的广阔前景。小平同志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而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⑧他对尼克松说,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对华开展商业活动,这也是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4、坚持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宗旨,继续同美国政府就涉及本国、亚太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对话、磋商与合作,以增加谅解、消除麻烦。中美两国虽然在双方关系上发生矛盾,但并不排斥两国在国际舞台仍有可以广泛合作的领域。美国要解决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维护自己在全球各地的战略利益,不能不取得中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正是因为中美双方保持接触,频繁会晤,在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柬埔寨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等地区矛盾中相互沟通达成协议,因而使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在某些领域



自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虽因台湾问题尚未建交，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服这一难题的诚意。尼克松访华时曾承诺，他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11月7日，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再度获胜，总共获得47169841张选票，比他的对手民主党竞选人麦戈文多了近17500000张。这是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中超过对手票数最多的一次。这表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执政4年的政绩、特别是对其在打开中美关系方面的成就是满意的。然而，正当尼克松踌躇满志准备实现他的宏伟目标^①之时，一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而且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那么，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水门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尼克松的第二次竞选说起。

“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

●官力

一、祸起萧墙，几个“鸡鸣狗盗之徒”潜入水门大厦

“水门事件”是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时发生在华盛顿水门大厦中的一起案件。当时有一份不甚出名的《迈阿密先驱报》登了一则《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的消息，说有5个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其中4个来自迈阿密。他们戴着橡皮手套撬开房门，偷拍了民主党的

秘密文件，并在暗处安装窃听器，准备偷听民主党人密谈竞选策略的内容。那么，这几个“鸡鸣狗盗之徒”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原来他们是尼克松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以及4个曾当过中央情报局雇员的古巴裔美国人。

麦科德的被捕引起了民主党人的兴趣。民主党竞选总部主席奥布赖恩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他还无不夸张地说，这个窃听事件“提出了我在二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所

遇到的关于政治过程是否诚实的最吓人的问题。”^②而尼克松竞选总部负责人、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则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声明，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会，也不是由它所同意的，并说他本人对于麦科德牵连在内的报道“感到惊愕”。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尼克松同意，共和党开始销毁罪证，编造各种解释水门事件的不实之词，极力把水门事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尼克松还赞成促使中央情报局去干涉和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因此

还取得新的进展。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94年4月11日。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172页。

④(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第262页。

⑤《新中国纪事》第655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311、325、321、332、352页。

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第424、427页。

⑮《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第136页。